

论“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

金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 生产力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一切经济社会现象归根结底受生产力状况所决定与制约。“新质生产力”是对国家发展方略及政策取向的原则提示,是将国家发展的方略核心,定位于“聚焦生产力,发力新科技”的实践方向;“新质生产力”既要有科技创新的要素结构,也要有创新担当和允许试错的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人才政策取向,能否适应更需创新激励与权责担当的就业结构和工作秩序,对经济发展形势具有关键性影响;一心谋发展,聚意高质量,是众望所归的人民意愿,也是国家选择发展模式的政策取向。人类社会随着科技创新,特别是数字化和 AI 技术的长足发展,重复类工作将被大量替代,新创类工作不断涌现,纠管类工作得以优化。未来由于生产力的质态变化,产业组织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对经济系统中组织资本和信任资本具有更高要求。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国家方略; 政策取向; 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 F124; D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24)02-0001-08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重要概念,指出整合科技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①。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②。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③。

此后,我国各部门和地方以“新质生产力”为中心概念进行学习探讨并部署相关工作,理论界和传媒界也迅速作出热烈反应。“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形成,基于捕捉到了现实中极为重要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动向,并以理论提炼的表述方式,指出了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须把握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新质生产力”所表达的是对中国发展方略及政策取向的原则提示、核心观念和重大政策选择意愿,关系中国发展的大思路、大方向、大战略。

本文围绕提出“新质生产力”所表达的国家方略及政策取向进行初步讨论。

一、国家方略核心取向:聚焦生产力,发力新科技

“新质生产力”作为国家发展方略的核心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人

收稿日期: 2024-02-18

作者简介: 金 磊(1950—),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① 新华网,2023年9月11日。

② 人民网,2023年12月13日。

③ 新华社,2024年2月1日。

类社会在发展历程中,其决定和影响因素极为丰富多样。人们只有在对复杂现象的观察中,捕捉到最重要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和因果关系,才能发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或基本趋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①,在对极为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的观察中,抽象出最具决定性的现象关系,“生产力”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这一历史观体现“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一切经济社会现象归根结底受生产力状况所决定,或制约。这是“一言以蔽之”的真理性认识和理论性判断,并且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发展模式不仅高度多样化,而且在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发展状况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力也不尽相同。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何为决定性核心因素?这不仅是历史发展漫长过程的核心因素,也是现阶段国家方略的核心因素。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作为根本性物质力量,是决定历史发展长程的核心因素。在社会发展的各具体历史时期,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有时表现得十分直接和显著,且关系清晰、易于理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则往往表现得比较间接和迂回,关系复杂、较难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可能表现为生产关系变革及上层建筑革命,“辩证”地成为一定时期发挥决定性历史作用的关键力量。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可能直接影响重大历史事件和国家发展局面,而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却可能并非显而易见。此时,究竟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核心因素为何,则可能极为难以判断,往往形成对国家发展方略的不同认知和政策主张,导致所谓“政治路线斗争”。

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坚信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基础理论上信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性,而且在国家方略思维乃至政策选择上,有效体现生产力第一性原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实践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这一原理在具体实践中的把握多有“争论”,甚至多次发生过违背生产力第一性原理而出现“大折腾”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次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即摒弃各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论调和政策主张,而坚持生产力第一性原理,并且充分地体现在国家发展方略中,即使发生不测事件,也绝不动摇、义无反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就国家发展方略而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坚持生产力第一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取得的,并且体现为生产力标准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历史证明,国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及其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才是最具真理性的国家方略取向,并据此确立了生产力第一性的政治原则。

生产力第一性原理基于对生产力性质的深刻理解,即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力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具有“元初”性特质。中国作为由唯物史观指引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方略“初心”萌生于生产力的元初本性。生产力之于人类发展,如同生命细胞之于生命体繁衍,也如同商品二重性之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其朴素的元初基因,孕育着成长的无限张力。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生产力具有吸纳新生因素的包容之力,可以聚集鲜活的科技之力。人类在发展历程中,特别是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活跃、积极、革命秉性,集中体现于科技之力的深度融入,彰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特征,进而使生产力的新质态充分呈现新兴科技的强大创造力,彻底改观了人类发展的“生产力-新科技”交融态势。

^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非马克思原话,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史观理论的概括性表达。参阅卫兴华,大家手笔: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超越了西方经济学,人民网,2017年4月10日。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实质上就是将国家发展的方略核心,定位于“聚焦生产力,发力新科技”的实践方向,而“生产力第一”和“第一生产力”则成为经济发展叙事的重要原理和机理逻辑。一方面,我们用哲学语言表达,在诸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体中,突出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体中,突出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突出科技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坚信,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是生产力发挥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在生产力各要素中,科学技术具有第一位的积极作用,集中体现生产力的活跃、积极和革命性特质,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底层逻辑。国家方略核心取向决定国家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战略选择。我们如果能抓住“牛鼻子”,就可牵动其全身;同时,只有认定新兴科技和科技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最基本特质,并据此确定以发展生产力为优先选择的国家方略取向,才能观念上“正本清源”,就可以在政治上不争论、不折腾、不偏航,使中国持续走在方向正确的国家发展道路上。

二、政策选择取向：凝心聚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中国以“聚焦生产力,发力新科技”作为国家发展方略核心,不仅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方略意愿。这表明,中国在和平发展时期,必须始终聚精会神谋求经济发展,一心一意追寻高质量方向,体现了全民族和全体人民最大的利益诉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的政治原则和政策选择取向不仅深入人心,广受拥护,而且也符合亿万百姓心愿,是中华民族千年渴望。中国进入新型工业化时代,党中央作出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判断,并进行一系列政策安排,一心谋发展,聚意高质量,是众望所归的人民意愿,也是国家选择发展模式的政策取向,更是亿万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以经济高质量为目标,而且以高质量发展来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积极应对各种复杂矛盾的挑战,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国家方略意愿和政策选择依据。经济发展成效是政府政策的首要目标和评价得失的优先标准,归根到底是广大百姓最大可能地获得最大切身利益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面临国内国际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的冲击和压力。在此复杂形势中,我们能否排除各种干扰和歧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折腾,不散心,聚精会神拼经济谋发展,则是严峻考验和政策选择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表明党中央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充分信心和坚定意志,发展方向了然于心,向好预期胸有成竹,是对增强信心和改善预期的激励。中国凝心聚力于经济发展,关键在于信心和预期,国家政策选择的关切取向和着力环节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关切和着力供给侧。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特别是对于宏观经济态势,主要关注需求,即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基于此经济学范式思维,主张着力于需求扩张环节,对当前经济形势就会感觉方向迷茫,也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新质生产力”思维着眼于供给侧,国家就可以从增强供给侧能力和效率的环节,提出各种应对政策举措。

二是关切和着力长期性。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主要关注短期均衡和短期经济目标的政策调节,对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设立和实现,缺乏有效分析方法。“新质生产力”思维主要着眼于国家中长期目标的确立和实现,力图对未来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出设想和战略意向,以及据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安排,包括市场经济规则建构和发挥体制优势(例如,新型举国体制)的改革举措等。

三是关切和着力创新性。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传统主流经济学所关切的企业创新,是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和所谓“破坏性创造”。“新质生产力”思维着眼于国家科技创新,特别

是颠覆性、原创性科技创新。与传统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企业创新相比,“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产业创新更具革命性,特别是假设基于重大科技创新的未来产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四是关切和着力开新局。基于对经济发展的供给侧、长期性和创新性的重点关切,“新质生产力”更倾向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切,其所提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大程度表现对开拓新局面的期望、规划和制度安排。因此,“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可以形成前瞻性战略规划,以体现国家发展方略取向的领域选择和实施构想。从而使政策关切和政策着力都可以落到实处,表现为重大产业的可行政策选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未来产业进行勾画和布局,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六大产业发展方向。进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等七部委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①,提出了“未来高端装备”发展的十个方面,包括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新型显示、脑机接口、6G 网络设备、超大规模新型智算中心、第三代互联网、高端文旅装备、先进高效航空装备、深部资源勘探开发装备等。政府的政策规划或选项导引,不是行政性计划安排,而是体现国家方略的政策选择取向,并据此而以“干实事”的创新行为,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可为、政策可行、成效可期。

三、人才政策取向:激励新创,重在担当

生产力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的行为,“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高度科技创新的生产力,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配置和人才持续供应。“新质生产力”是高素质人才所推动的以科技创新、新兴科技和高新产业为特征的现代生产力,而高素质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和主动性组织力量。

与数千年人类发展相区别的是,工业化历来具有“机器替代人”参与生产过程的基本性质,“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未来产业具有更大规模的“机器替代人”的性质,而且是“智能机器人赋能替代人”的新型工业化。因此,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确有排挤就业的特征,使传统的重复性工作岗位要求减员;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体现的新型工业化技术结构,又必然具有形成新型就业结构的趋向,对人才就业提出更高素质要求。当今社会,由于科技创新加速,新的就业岗位不断出现和增加,很可能超过人力资源培育的通常周期,所以以“干中学”“自成才”为特征的适应性就业岗位和工作方式,又会成为许多新创就业岗位的人才成长路径。由此,人才就业结构可能出现“岗位缺人”和“人缺岗位”并存现象,这期间,重复类工作的就业需求减少,新创类工作的就业需求增加。人才结构与技术结构的非充分匹配不仅是“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新常态,而且科技创新性越强,技术迭代越快,这样的现象愈加突出。人才队伍,特别是重要责任岗位人才,对于科技创新担当岗位配置不均衡性风险,是“新质生产力”就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样的就业结构,可以产生新型人才成长的激励效应,即努力以新的工作能力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干好从未有人干过的工作,或就职于未曾设立过的岗位,就业不是“交接班”,而是“适新岗”。这意味着,首任性岗位和新创性就业,就成为“新质生产力”人才就业岗位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国家人才政策取向就应更具重在责任担当的特征,担当性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可贵的人力资源。因此,国家人力政策取向最重要的是,形成使担当性人才勇于创新的工作秩序,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

既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高度依赖于科技创新,以“新”为路,敢为人先,需要极具进取心的创新人才队伍,那么“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人才队伍要有更大责任担当和主

^① 2024 年 1 月 29 日,工信部联科〔2024〕12 号。

动创新精神,而且也要有容忍失败、包容纠错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创新性越强的领域,成功概率可能较低;另一方面,新创岗位的工作失误可能较多,但失败可以是成功之母。“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国家发展重要方略,既要有科技创新的要素配置结构,也要有创新担当和允许试错的制度安排,发挥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创新机制。

“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推动,特别是大数据、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运用,新型工业化的智能机器人,具有了生成式智能的认知能力。那么,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物统治人”^[1],是否会变为在科技能力上机器对人的更彻底统治,使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越来越受到技术性规则的极大限制,还是如马克思所预言或理想的,未来世界可以成为“人统治物”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2]。

“新质生产力”提示的社会发展方向,不是人的行为越来越受智能机器人控制,而是智能机器人应成为人的高赋能工具。高新技术的运用,不是任意限制人的自主和自由,“框定”人的行为,迫使人必须“守规矩”地被动服从机器的程序,而是机器应有助于人的更大自主和自由。智能机器人尽管在诸多领域和工作层面必然超越人的能力,而这也促使人的活动更为便利和高效,但绝不能因此而反客为主,使人自身反倒成为被智能机器人支配的服从性工具。人的自主和自由就是选择权,如果没有选择权,就背离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意义。如果机器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显著提高,而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状况却表现乏力,碳基生命体如果因科技进步而退化为受硅基生命体支配的被统治者,那是人类不可接受的后果,是违背伦理的。

我们在现实中可以体验到各种人的行为受“科技”限制的现象。例如,从技术手段上说,资金的支付完全可以极为便利地即时完成,但现实却是,支付方式的“技术主导”偏向反倒使资金支付的“账期”(支付资金到账时间)普遍延长。各种“审批”环节的技术性要求由于更为严格,并且完成支付的程序更“科学”“严密”了,但人的行为却因而更受约束且难以通融。也就是说,机器替代人,规则不可违,以防“万一出差”,因而资金流转效率反而普遍降低了,似乎落入了“流动性陷阱”。

人活经济活,经济活才能生产力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仍然是人的创造性生产力,即人主导的和以人为本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国家发展方略取向是,尊重人的主动精神和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更可行地向着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进步方向发展。

在工业化时代,社会就业结构特征可以反映生产力状况。在传统工业化时期,生产力尽管显著提高,但技术迭代周期相对较长,颠覆性创新频率较平缓,标准化生产和重复性工作所体现的分工合作关系,可以体现较大竞争力。新创工作岗位和纠管性工作岗位由于变动有限,因此就业结构的基本格局相对稳定,技能继承性较强。然而,人类社会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技术迭代周期和颠覆性创新频率加速,产业技术结构日趋复杂,新创性工作层出不穷,且纠管性工作岗位更为复杂。因此,人才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显著加快。

当传统工业化转向新型工业化的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对就业结构和工作秩序的影响,表现为重复类工作、新创类工作、纠管类工作^①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科技创新特别是数字化和AI技术的长足发展,重复类工作将被大量替代;新创类工作不断涌现;纠管类工作力求适应。面对这样的挑战和所蕴藏的机会,人才政策取向,能否适应更需创新激励与权责担当的就业结构和工作秩序,与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观察全社会的人才结构,即人力资源配置状况和变化趋势动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判断经济发展形势的基本状况。

① 重复类工作指产业技术和分工合作关系较稳定的继承性就业岗位。新创类工作指产业技术结构和分工合作关系发生重大变革所导致的新产生就业岗位。纠管类工作指对生产性工作进行组织管理和行为纠正的非生产性就业岗位。

四、产业组织取向:市场主体的形态建构

“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表明党中央充分认识到科技能力的全球配置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以来,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实现了突破性发展,从经济技术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发展成为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的大国。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突出表现是,产业技术更加接近于高科技水平,以至逼近基础科学研究突破前沿,因而更加需要由科学研究来助力解决产业高端技术的原创性问题。这样,在中国产业发展的高端技术领域中,科学和技术的双向植入性质^[3],越来越体现为生产力的颠覆性变革和新质态生成。科学技术广泛而深度注入社会生产力体系,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突出性质。因此,国家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更具决定性实践意义,即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

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表明,现代科技进步,特别是实现产业转化,不是孤单发生或个体独立现象,而是集群现象,被称为“企业集群”“业态集群”。现代科技进步实践,特别是其产业化运用,表现为“现象集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称之为科技进步的形态特征的“域定”性(domained)。这是对科技创新推进生产力发展所呈现的产业组织形态特征研究。

基于布莱恩·阿瑟的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现代技术发展表现为“域”和“域定”的形态。所谓“域”,就是各种要素和现象聚集成的集群。“当现象族群(包括化学的、电子的、量子的)被开发并加以利用以后,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技术聚集。”“一个域可能是任意一个由于不同要素构成的、从中可以产生设备和方法的集群,以及产生这些设备和方法所必须的实践、知识、组合规则及思维方式等的集合。”^{[4]75-76}而且,技术之域极为活跃,具有“重新域定”的动能。“重新域定(redomained),是指以一套不同的内容来表达既定的目的。重新域定不仅提供了一套新的、更有效的实现目的的方法,更在于它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4]79}因此,在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进步进程中,技术的颠覆性改变,产生着无数新的可能性,包括各种业态集群。

可见,“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预示市场主体的产业组织形态必然具有多样化的域态特征。“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和发展,以及各类业态集群,将由多种形态的市场主体协同承载和互动推进,并且正是由于生产力的质态变化,产业组织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以人工智能发展和产业化为例,进行原创性科技创新的市场主体的组织形态,并非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传统企业,而是非营利组织。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①旨在开发和推广人工智能技术,向公众开放专利和研究成果,使人类整体受益。ChatGP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是其最著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成果之一^②,该科技创新成果向世界开放,即社会性企业是实现人工智能发展的最重要市场主体的组织形态。社会企业的基本性质是,以市场化方式实现社会性目标,既不是商业性(营利性)私人企业,也不是政府公营机构,其实体组织是由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共同组成,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一些营利性企业,如微软公司成为其重要出资人和合作者。又如,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具有慈善组织性质,但直接着力于促进科技创新,资金投放重点领域包括改善农业效率、医疗健康、气候变化以及推动技术创新的多个领域,对科技创新有重要贡献,并可以实现资金投入和增加的可持续。这本质上也是社会企业,具有生产性。可见,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在科技进步以及社会运用中,都可以发挥各自独具优势的产业组织功能。这表明,科技创新为了更有效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即实现产业化运作,需要进行产业组织形态的创新。

① OpenAI 位于美国旧金山,由营利性公司 OpenAI LP 及非营利性母公司 OpenAI Inc 组成。

② 2024 年 2 月 16 日,OpenAI 发布了一个视频生成模型 Sora,标志着文本生成视频领域的重大突破。

中国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特征是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既是改革体制的中心环节,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作为特殊企业,具有独特的产业组织形态特征,本质上也可归为社会企业,即以市场经营方式实现国家安排的企业主责主业使命;国有企业行为的首要目标不是获取利润,获取利润是体现企业经营效率和业务可持续的工具性方式。显然,国有企业在“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国家发展方略上,可以发挥独特的功能,承担重要使命,特别是在发挥中国独特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上,承担重要功能,探索产业组织形态的深化改革。因此,中国具有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组织创新的更大选择空间。

当然,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市场化经营的营利性企业是为数最多最普遍的市场主体组织形态。按传统主流经济学的观念,企业的组织行为是同质化的,即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如果偏离这一目标就会失去市场竞争力且难以生存。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简单。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生产性组织形态,其具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可以按使命意愿进行模式选择和形态构建的^[5]。企业即使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也具有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组织行为动机,使之更具市场竞争力和社会融洽性。这一性质,非常适应于“新质生产力”所提示国家发展方略取向,即需要各类市场经济主体,以相适应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形态,承担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使命。可以说,这是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本身所意涵的产业组织变革指向,即以产业组织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如果不进行产业组织创新,“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国家方略取向就缺乏实践“抓手”,虽然可以想象,但却难以实现。

纵观世界各国的产业组织及与之相应的产业政策,皆在发生根本性变革。美国即使崇尚“三零”取向(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和一向特别反对实行产业政策,现在也公开大肆实行以关税、壁垒和补贴等手段所表现的国家产业干预政策,完全背离其“三零”世界理念。这表明,世界的产业组织体系将发生规则秩序的重大改变,即使称之为“重塑产业组织”也并不过份。这在本质上体现了,国家组织能力和战略取向对重大产业政策的直接介入。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思维而言,“微观-宏观”范式虽是难以接受,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将表现得越来越具有政策创新性;其创新之源不仅是经济理性支配,而且受到各国各文明体的文化价值和制度历史的深刻影响,并表现为国家的组织行为。

国家组织能力和产业组织政策,是科技革命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资源。无论是综合经济体(例如,国家、地区、产业等),还是市场经济主体(例如,厂商、企业等),都必须有一定的组织化建构,即通过组织方式达成组织目标,或实现有效运转,获得良好绩效,所以组织能力是任何经济体和经济主体的重要素质。笔者曾将其定义为经济系统中的“组织资本”,与“信任资本”类似,都可以归类为经济系统中的“社会资本”范畴^[6]。“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国家发展方略中有效发挥作用,高度依赖于组织资本和信任资本的作用。市场主体的形态建构,特别是有利于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的市场主体新形态建构,必须基于一定的组织资本与信任资本条件或社会环境。因此,“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意涵着对于经济系统中组织资本和信任资本的更高要求。

新时代,“新质生产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织资本和信任资本状况的自信判断,即相信中国面临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具有推动科技创新的组织资本和信任资本优势。中国不仅有条件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而且可以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举国体制,以更有力的产业分工合作方式,来进行科技创新的重大工程和攻关突破。这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条件,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的独特优势。

组织资本和信任资本属于产业组织和经济体系的软实力。中国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有在显而易见的不足,特别是组织效率(畅通、活力、创新)和信任关系(信用、信心、信息)的改善和内化,仍然任重道远,必须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来使之更加健康强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意义不仅是对国家发展方略和政策取向的指引,而且进一

步明确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为此,我们就要充分发挥人的创新积极性,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创新和赋能产业创新的方向,形成有利于新创性就业和责任担当的工作秩序;必须进行产业组织创新,信任关系优化,以适应于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重大科技突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时代经济形势。“新质生产力”所提示的高质量发展内涵不仅是对国家发展方略的方向性指引,而且具有确定政策取向的重要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对方略核心、发展关切、人才政策和产业组织等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探究,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概念对正确确立国家发展方略及政策取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高利民. 物对人的统治——马克思《1857—1858 经济学手稿》解读[J].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8(2): 5-9.
- [2] 吕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共赢共享[N]. 光明日报, 2021-12-07(06).
- [3] 金碚. 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科技动力机理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23(4): 82-89.
- [4] 布莱恩·阿瑟. 技术的本质: 技术是什么, 它是如何进化的[J]. 曹东溟, 王健,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 [5] 金碚. 论企业何为——关于企业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 改革与战略, 2022(4): 31-42.
- [6] 金碚. 论经济的组织资本及组织政策[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4): 23-41.

On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Policy Orient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JIN Be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Productivity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that determine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ll economic and social phenomena are ultimately determined and constrained by the state of productivity. "New productive forces" is a principle reminder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orientation, positioning the core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the practical direction of "focusing on productivity and promoting new technology". The "new productive forces" should have both the element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innov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allowing trial and error. The talent policy orientation of a country, whether it can adapt to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work order that require more innovation incentives and accountability, has a crucial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ituation. Pursuing development with one heart and focusing on high quality is the popular aspi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the country in choosing a development model.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specially digitalization and AI technology, human society will see a significant replacement of repetitive work, and new and innovative work will continue to emerge, optimizing corrective work. In the future, due to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will also undergo fundamental changes, which will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organizational capital and trust capital in the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new productive forces; national strategy; policy orient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冯 蓉)